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魏宏运 左志远 主编 档案出版社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魏宏运 左志远 主编

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宝贵 郭年
于红霞 周永梅
封面设计：李新宇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魏宏运 左志远 主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 印张 11.25 字数 302.4 千字
1990 年 5 月第一版 199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0019—228—8

k·58 定价：6.50 元

前　　言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是国家教委博士点科研基金资助的“七五”规划科研项目之一。迄今为止，已出版的研究华北各块根据地的史书已不少，本书试图从整体上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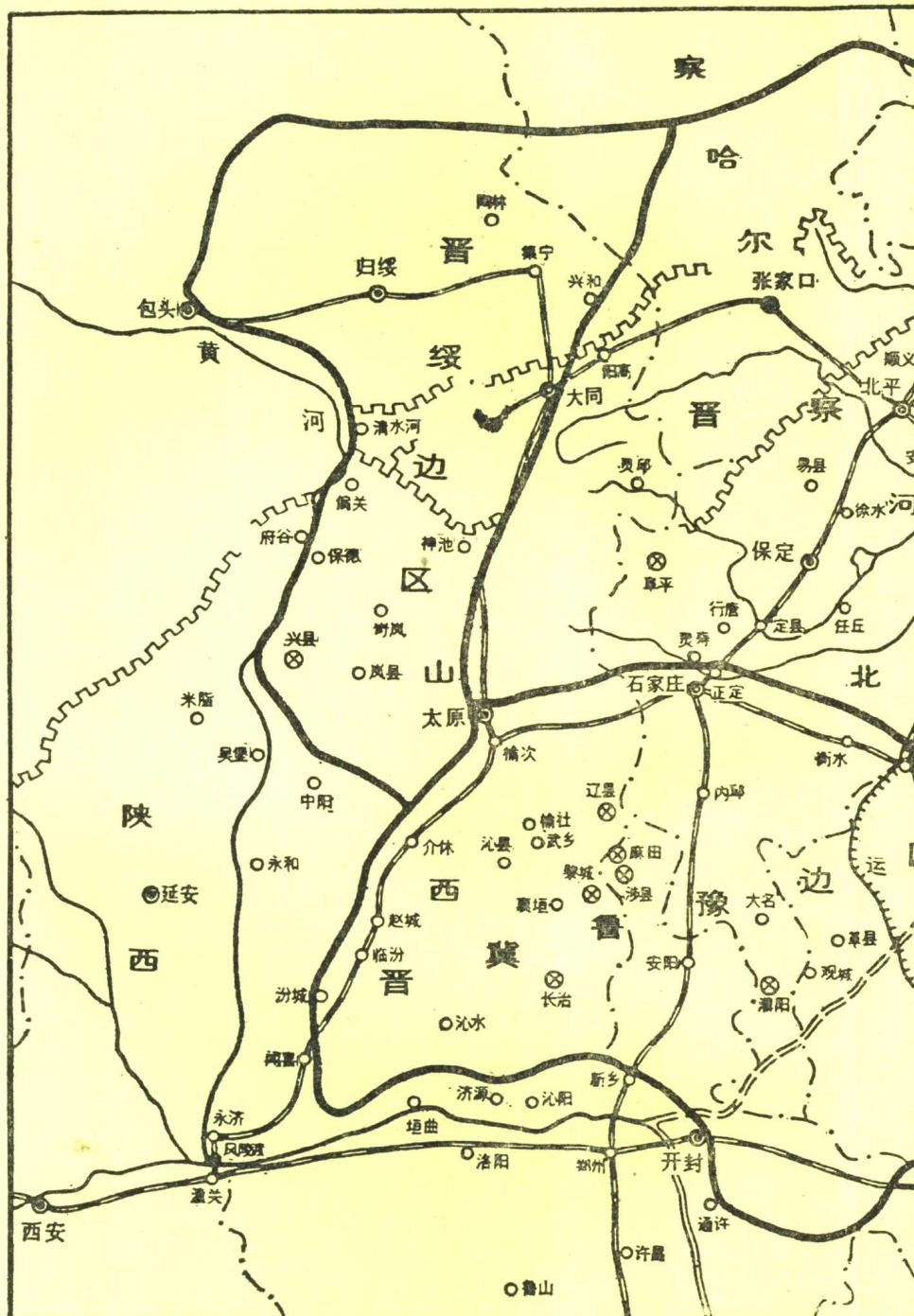
华北抗日根据地位于陇海路以北，黄海、渤海以西，黄河、包头、百灵庙以东，察哈尔之多伦、热河之赤峰、辽宁之锦州以南。其中包括山西、山东、河北三省之全部，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江苏、河南的一部，总面积约333万平方华里，总人口约8300余万。根据地分为五大块，即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1941年，冀鲁豫合并到晋冀豫，称晋冀鲁豫。这些根据地，是由八路军开辟的，创建最早，也最巩固，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它的创建和发展，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北敌后军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牺牲和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应当弘扬继承的。

我们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和搜集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有关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史实准确，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概貌。但对史料的掌握与取舍仍难尽如人意，史实的准确性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和读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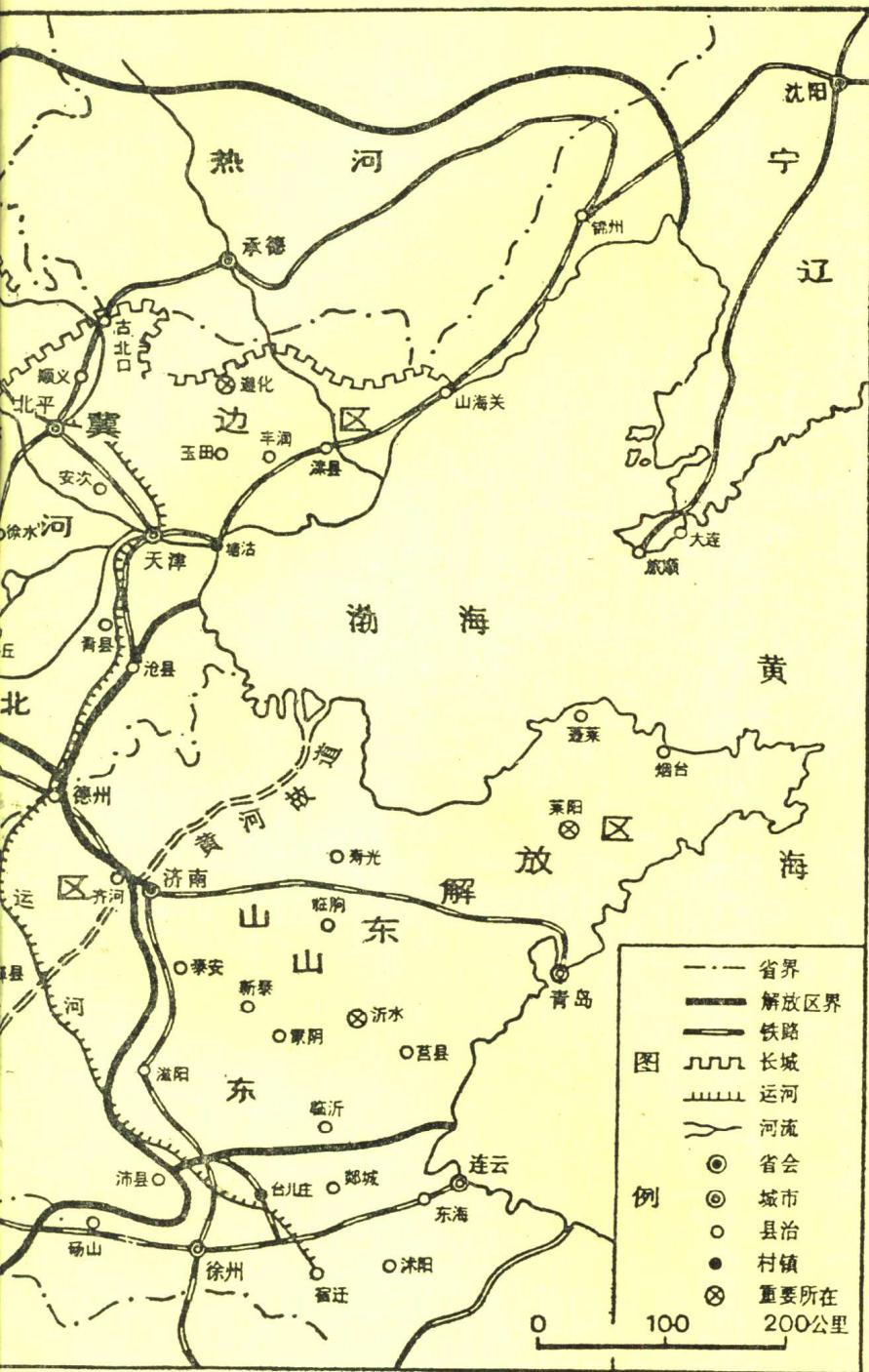
本书由魏宏运、左志远主编。编写者第一、八章为李振华，第二、三章为江沛，第四、五章为祁建民，第六章为左志远，第七章、附录为胡蔼立。

参与本书编写大纲讨论的有张洪祥、陈志远、刘健清、高德福、潘荣等；撰写中参考和吸收了有关专著和论文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编 者
1989年9月



华北抗日根据地



居地形势略图

194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抗日战争爆发	(1)
一 抗战前的华北.....	(1)
二 卢沟桥事变.....	(11)
三 八路军挺进华北.....	(17)
四 战地动员委员会.....	(23)
五 共产党人的游击战思想.....	(28)
第二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36)
一 从五台到阜平.....	(36)
二 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	(38)
三 冀东大暴动.....	(42)
四 “我们在太行山上”	(47)
五 冀南根据地.....	(53)
六 冀鲁豫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57)
七 创建晋西北根据地.....	(60)
八 大青山游击区.....	(65)
九 “三山” 起义.....	(70)
十 八路军挺进山东.....	(73)
第三章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辟	(77)
一 粉碎日军对北岳区的围攻.....	(77)
二 河北平原游击战.....	(83)
三 保卫晋东南战斗.....	(87)
四 聊城抗战.....	(92)
五 反磨擦战斗.....	(96)
六 百团大战.....	(104)

第四章 根据地建设	(113)
一 健全各级政治机构	(113)
二 建立银行	(121)
三 合理负担	(127)
四 减租减息	(132)
五 发展农业生产	(138)
六 双十纲领	(143)
七 黎城会议	(148)
第五章 反“扫荡”	(155)
一 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封锁	(155)
二 三光政策	(159)
三 冀中平原的“五一”反“扫荡”	(162)
四 狼牙山五壮士	(166)
五 黄崖洞保卫战	(169)
六 沂蒙军民反“扫荡”	(172)
七 田家会战斗	(175)
八 地道战	(178)
九 敌后武工队	(182)
十 粮食战	(187)
十一 贸易战	(191)
十二 反战同盟	(195)
第六章 励精图治	(200)
一 精兵简政	(200)
二 “三三制”	(207)
三 统一累进税	(215)
四 整顿三风	(219)
五 温村会议	(224)
六 合作运动	(226)
七 生产节约运动	(233)

八 抗旱灭蝗.....	(243)
九 军工生产.....	(248)
第七章 文化教育.....	(255)
一 新闻出版.....	(255)
二 抗战文艺.....	(265)
三 戏剧音乐美术.....	(277)
四 干部教育.....	(289)
五 群众教育.....	(300)
第八章 华北根据地的恢复和大反攻.....	(311)
一 “把敌人挤出去”	(311)
二 局部反攻.....	(316)
三 对日寇最后一战.....	(322)
四 抗战业绩.....	(328)
附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划沿革.....	(335)

第一章 抗日战争爆发

一 抗战前的华北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版图上，华北包括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华北五省二市位于黄河以东，渤海、山海关以西，陇海路以北，大青山以南的辽阔地区，占地面积达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800 万。该区不但盛产小麦、棉花等农副产品，蕴藏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为我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基地，而且该区西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北连外蒙，东接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南与中原苏(江苏)、皖(安徽)接壤。约占全国面积 2/3 的茫茫华北大地，全仰仗冀、鲁二省渤海沿岸 1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为唯一的出海口，地理位置举足轻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为兵家必争之地。“试览我国已往史乘，凡能征四裔，辟疆园，御外寇，守本土，未有不争幽燕者也，争幽燕者，争其地形，争其交通也，幽燕一失，纵成偏安之局，鲜能有延国祚图长久者。”^①此对华北之论述，无疑为精辟之言。

然而，30 年代的华北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宁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步步紧逼，华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呈现一派岌岌可危的局势。在政治上，到 1935 年底，华北五省已很混乱。军事上，除原有的新旧军阀派别系统外，又出现了规模日益庞大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和

^① 方显廷：《论华北经济及其前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报》单行本，第 36 页，1926 年。

卖国求荣的汉奸武装。经济上，华北既有中国当时不可多得的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又有极为原始落后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城市中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同时并存，机器工业、手工业相映存在，农村中土地日益集中，农民频繁破产，天灾人祸，乡村经济奄奄一息。在这混乱复杂的社会局势中，占山为王的土匪，打家劫舍的盗贼，以及名目繁多的会道门，更是层出不穷，不可胜计。

华北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民国以来就一直是军阀争斗的战场。南京政府建立前，直、皖、奉三派军阀均为争夺华北进行过激烈的战争。南京政权成立后，旧军阀虽不复存在，然新军阀却继之而起，阎系（阎锡山）、冯系（冯玉祥）、奉系（张学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互相倾轧，逐鹿华北。虽经中原大战，蒋介石以其冠冕堂皇的正统旗号，玩弄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治手腕，使冯、阎屈服，实现了全国表面的统一。不过，冯阎此时在华北仍有相当的实力。山西为阎系所控制，山东为冯玉祥旧部韩复榘所把持，河北、平、津、察哈尔为于学忠、宋哲元所掌握，于属张学良的奉系，宋却是原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时张学良已完全屈服于蒋介石，因此中原大战后的华北，实际上处于蒋冯阎的共同控制之中，蒋利用各派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制造均势，维系着华北“一统”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并日益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步骤，南京政府为维护其苟安的局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使华北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历史事实证明，华北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日益加深同步发展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从1933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将矛头直接指向华北，其侵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长城抗战到河北事件，日本对华北采取以武

力相威胁的军事侵略政策。日轻而易举地控制中国的东北之后，竟欲进一步扩展其侵略区域，它先扬言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以为侵略华北的先声，后又称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以作为攻取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舆论准备，随后便调兵遣将，对山海关、热河、长城等地发动攻势。1933年1月1日陷榆关，3月3日克承德，接着猛攻长城，迭陷冷口、古北口、喜峰口诸险要及滦东诸县，同时移兵察北，进攻沽源、多伦一带，5月30日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实现其侵略华北的第一步。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一面阻止中国武装保安队开进战区，同时加紧战区的匪化，以战区为伪满的第一道防线；一面继续在察东察北推进军事行动，直到1935年春炮击独石口为止，日本帝国主义无时不以武装侵略政策为威胁中国屈服的手段。到5月所谓河北事件发生，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尽数南调，平津及河北国民党党部也自动撤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形同虚设，于是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势力顿时缩退，冀察两省几乎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至此，日本完成了侵略华北的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河北事件到1936年日增兵平津。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已预感到如继续对华采取武力侵略行动，必将引起与远东利益有关各国如英、美、苏等的严重磨擦，因而也将使中国军民被迫走上武装抗战的道路，如果易以政治侵略，利用大小汉奸以自治运动方式，偷天换日，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又可减少与中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英美诸列强之干涉。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利用河北事件控制了华北之后，又开始进行“华北五省独立”的阴谋活动，欲以政治侵略方式，改变华北的颜色。

30年代中期，日本派遣土肥原、松井等分赴华北各地，物色汉奸傀儡，策划华北自治。最初欲起用北洋军阀头子孙传芳，继而收买吴佩孚的旧部白坚武，制造暴动事件，组织华北自治政

府，但被河北省主席兼津沽警备司令商震和万福麟所镇压，其后，日驻华武官高桥垣赴晋，对阎锡山有所期待，亦遭拒绝。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北实力人物宋哲元、商震等频繁接触，要求他们掀起华北自治政府旗帜，宋等采取回避态度。

土肥原等在华北五省的频繁活动，游说当局实行自治，结果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1935年冬，平津学生反对“自治”的“一·二九”示威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破纪录的救亡高潮，将革命重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华北五省的政治阴谋，不得不在中华民族伟大救亡运动的威力之下，宣告失败。只有甘心作汉奸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等人，在日本的利诱与威逼之下，粉墨登场，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则一味地妥协让步，于1935年12月18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第三时期，从增兵平津到卢沟桥事变。此时，尽管日本深知华北分离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但华北毕竟是其南征中国，北侵苏联，抗拒英美，独霸太平洋地区的生命线。更何况华北又有蕴藏丰富的资源，广漠无垠的农村，近于中国人口半数的广大群众的购买力。日本以资源的贫乏，准战时工业的急需发展，国外市场被英美关税壁垒的限制，华北正可作医治日本统治匮乏的给养地，便以中日经济提携，开发华北的经济侵略政策，取代了所谓自治运动，成为其侵略华北第三个时期的主要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由军事而政治，又由政治而经济，步步紧逼，使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局势变化不定。到1935年底，华北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一是原有的与南京国民政府貌合神离的由阎、韩所控制的晋、绥和山东政权，一是具有半独立自治性质的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再一个便是完全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傀儡政权——以殷汝耕为首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一地，三种不同性质政权同时并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种情况导致华北行政混乱，城乡社会动荡和人民生活的不安，呈现出极其复杂纷繁的景象。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华北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与其政治结构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30年代，日本大力开发华北，以期独占中国广大的市场。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所谓开发华北经济，都是经济侵华的具体体现，都是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这一既定方针服务的。据天津1935年3月30日《益世报》载，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的新投资，在华北方面共达73300万元，自1935年推行中日经济提携以来，又增设了资本1000万元的满铁旁系“兴中公司”，专门以华北为开发对象。该公司成立于1936年12月，1000万日元的暂定资本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总公司设于大连，天津、上海、东京设有分公司。商业方面，日在天津设有所谓“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等机关。还利诱旧官僚，组织所谓“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机关从事活动。^①为了掠夺华北棉花，日在华北成立了“华北棉花会社”、“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团体。在华北的六家日本纱商，成立了所谓“华北棉花协会”，试行统制华北棉产，在天津、青岛成立棉花交易所，控制华北的棉花市场。“兴中公司”更拟定了华北植棉五年计划，以全部霸占我华北棉产为目的。^②到1936年，占全国棉田面积30%的晋、鲁、冀三省棉田1700余万亩，已被日本所夺取。^③至1937年，日本陆军省已批准塘沽军事化学研究社、北支那铳炮火药制造株式会社的兴办方案。“兴中公

① 何东辉：《华北军需资源与中日战争》，《反攻》第2期，1938年2月16日。

② 孙怀仁：《两年来日本对华之经济新进攻》，《世界知识》第4卷11期，1936年8月16日。

③ 蒋初：《中国棉纺织业的挣扎》，《生活星期刊》第19号第1卷，1936年10月。

司”更添设盐业部，包揽长芦盐产。此外，龙烟铁矿的开采，沧石路的修筑，乃至大沽港的开辟等大的投资活动，也日见其具体化。^①

日除不断采取掠夺中国的富源，实行所谓《经济提携》等手段外，还对华北实行疯狂的武装走私、商品倾销，完成对华北经济的独占。

日本的侵略，再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自然灾害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平、津为代表的华北各大中城市，基础薄弱的传统民族工业日益凋敝，许多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与此相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厂企业却日益增多，不但有限的重工业几乎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而且在食品及棉纺织业等主要轻工业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也日见增加。洋货充斥市面，城市经济带有极浓厚的殖民色彩。

与城市经济相比，整个华北经济亦与当时全中国的经济一样，其乡村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平、津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之外，其余地区都为落后的封建闭塞的农村。在一些偏僻的山区，老百姓不知有铁路、公路，有的甚至不知清朝已亡，民国早至，只知交粮纳税，苦撑度日。如果说华北有限的城市经济到30年代殖民性质已日益加深的话，那么华北的农村经济当时依然呈现浓厚的封建色彩。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断由城市向乡村发展，以及华北政局的动荡不安，加上30年代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村经济破产，农田荒芜，家庭手工业产品被洋货所排挤，农民失业，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纷纷拥入城市、城郊或迁移他处，传统的封建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动摇，但土地占有的不合理情况仍然相当严重。据调查统计：1936年，河北保定10个村庄，占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土地13.4%，8%的富农占有土地27.9%，

① 骆耕漠：《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世界知识》第6卷第3号，1937年4月16日。

23.1%的中农占有土地32.8%，而占总户数65.2%的贫雇农则只占有25.9%的土地。^①1937年晋察冀北岳区45个村庄，占总户数2.4%的地主占有土地16.4%，8.5%的富农占有土地21.9%，35.4%的中农占有土地41.7%，47.5%的贫雇农占有土地19.1%。^②这些数字表明，30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集中是严重的。土地的集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数目巨大，必定引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农村社会的混乱，导致农村经济的萧条。

随着华北政治经济局势的日益严重，华北的军事构成也变得十分复杂。“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在北平设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作为统管华北军事的最高机关，但事实上形同虚设，华北各实力人物，手握重兵，各行其事。1935年6月4日，《何梅协定》秘密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黄杰、关麟征、于学忠等部数万中央军、东北军尽数卷甲南退，日则乘机扩大在华北的武装，正规军增加到20000人以上，加上“少年义勇团”、“在乡军人会”等武装团体，日在华北的武装力量达30000人以上。这些军队以丰台车站为驻扎中心，组织完全按照战时的编制，有机械部队，化学部队，飞行部队等特种部队。

日本还在华北各政治军事中心地带北平、通州、天津、山海关、张家口、归绥、包头、额济纳旗、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设立变相军事组织的特务机关，刺探我国军事外交消息，分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训练汉奸，制造暴乱等。

政治的极度混乱，军阀的连年征战，为土匪和各种会道门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土壤。民国以来，华北一直是土匪和各种会道门频繁活动的所在。到了30年代，在华北除了哥老会、洪门、义和团等原有的会党残余组织外，其会道门组织主要还有一贯道、圣贤道、天门会、黑胡子教、武旗会、白旗会、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绿枪会、小刀会、扇子会、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页。

②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0页。